

延安文艺丛书



诗歌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延安文艺丛书

第五卷

诗 歌 卷

《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高 彬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91,000 印张：20.75 印数：1—11,580

统一书号：10109·1703 定价：（平装）2.30元（精装）3.25元

## 总 序

丁 玲

最近有一位年轻作家同我谈到他在创作上的苦闷。他有生活基础，他的农村生活可以说很丰富。但是他感到自己创作的路子打不开，形式上不能创新，而且嫌自己的作品有些土气。另一位中年作家，四十年代就开始写作，他熟悉部队生活，也有长期农村生活的经历，写过不少好的作品，现在他谈到他在创作上的问题，也认为自己不易创新。对于应该遵循哪条道路、怎样继续往前走，他感到有些迷茫；他对自己原有的一套方法不满意，也嫌自己的土气。这些感触，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这样的问题，目前可能不少人有同感，他们也正在踌躇、徘徊，有的人正在努力想在形式上突破自己惯用的手法，执意探索、追求和创新。我想这是好的，对的。一个创作工作者、一个作家应该经常努力尝试，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能更确切、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极精致、极纯净的形式表现出来，给读者或观众留下清新、激情和永远向上的美好的遐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终身不倦地为之奋斗的。

我以为一件艺术品，固然需要美的形式，但更应有美的设想。文学作品表达的方面比较多，内容比较丰富复杂，更

需要有较高的思想情趣和完整的艺术形式，以及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可以影响内容，内容更能影响形式，新的内容很自然地会冲破一般的旧的形式。

现在一些同志要求创新，大多数看来都有点偏重于形式方面。他们对自己惯用的表现手法，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大家在文学创作上惯用的手法感到不够用，感到需要有所创新。他们把原来的表现手法笼统地说是“土”。那么“土”的对立面自然是“洋”了。对此我们不能不先研究一下，弄清楚究竟什么叫“土”，什么叫“洋”？我们应该摒弃什么样的“土”，而追求什么样的“洋”。

我以为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大体上都是洋的，都是走的西洋的路子，都是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的欧洲文艺的影响。几十年来我们的美学理论、创作方法、什么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什么现代派、抽象派、唯美派，……无一不是从洋搬来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对于我们祖国，我们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些宝贵遗产却注意得不够。我们中只有过很少一部分人提倡民族形式，要求继承我国的民族传统；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提倡民间文学；这就是一般人所谓“土”的。但现在一些人所嫌弃的“土”，并非只限于民族民间文学，而是泛指一般的表现手法，即所谓现实主义文学。他们心目中的“洋”，则是指近代流行欧美各国的所谓现代派、意识流（实际也在慢慢过时），不很讲究社会效果，超现实的纯粹艺术的文学形式等等。或者这样说都不够确切，这些同志是不喜欢曾拘束或损害过我们文学事业的教条主义，党八股，或者是“四人帮”时代的“假”、“大”、“空”，这些自然都是要不得的。但要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要反对“假”、“大”、

“空”，用什么来反对呢？是否就是追求形式上一些新奇或者把过去曾被革命人民和进步青年抛弃了的一些腐朽颓废的、脱离生活的靡靡之音，或者只讲究趣味、供有闲者茶余酒后、寻欢作乐的消遣品，还有那些描写无望的爱情、空虚的心灵、灰色的人生的诗歌，把这些当着高不可及的艺术精品加以模仿呢？创新是完全应该的。文学艺术一定不能墨守陈规，一定要推陈出新，一定要有新意。我认为作家要不脱离生活，时时和群众一起斗争前进，建设新生活，写出来的作品饱含新意，自然就会有所提高。不管你的创作是用中国固有的民族形式，或是从外国拿来的形式，你的作品都会有所变化，都会更加丰富，都会有所创新。更简截地说，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矛盾斗争，作家的思想感情、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作家对生活的剖析与感受，才能更敏锐、更正确、更深刻、才能够取得敢于和善于抒发这种职业的、近于天生的、充满诗意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到生活中去，到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的斗争的生活里去，长期与人民在一道，从人民日常的生活中、德行中去体会去练习。这样再创作，“新”就会油然而生。作家如果永远停滞在一个水平上，无论思想或艺术，即使曾经达到过高水平的，也会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前进，而作家却脱离了生活，高水平也会变为低水平，变为老一套，变为不受欢迎的了。

收集在延安文艺丛书里的这些作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少数英雄的天才创造出来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密切联系，从苏区文艺、红军文艺、以及“五四”以后新文艺与左联提倡的大众文艺等优良传统发展起来的。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

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这些作品排斥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反对崇洋、崇大，反对关门提高，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继承民族传统，运用戏曲、秧歌、小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陈出新，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新戏曲、新秧歌、新音乐、新绘画木刻，以及饱含中国情趣的新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这是延安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们不断学习、努力，从旧变新，土洋结合，从低到高才获得的伟大成就。

记得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初到苏区陕北定边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宣传队的表演，他们在乡村的土台上表演“红军舞”、“网球舞”、“生产舞”。战士和当地农民群众，都看得很有趣，觉得很新鲜。我想这应是属于“洋”的。因为其中很多是模仿苏联红军的，很多乐曲也是从苏联内战时期红军歌曲移植来的，但歌词是中国的，是歌唱中国革命的。此外还有许多山歌小调，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整理改编，歌词满含激情，曲调朴实优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人人爱听爱唱，一种战斗的、乐观的、浪漫的热烈情趣，真使人心醉。这些歌曲，几乎人人都唱，根本没有谁去划分哪是“土”的，哪是“洋”的。那时延安部队、机关、团体都设有列宁室，后来改称救亡室、俱乐部，俱乐部里都办有墙报，上面载满了各种诗歌、散文、小小说等。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的史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十余万字的《红军长征记》，其中有战士的作品，也有著名的红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如张爱萍、陆定一、李一氓、傅钟、彭家伦、洪水、魏传统等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声有色，纪录了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英雄人物和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以及对长征途中民情风物

的描绘，都是充满激情的美丽的散文。其中有许多篇章，后来发表在一些刊物上，仍旧吸引着年轻的一代，帮助他们了解、学习和缅怀先辈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贞。这一史册的原稿现在收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这是值得庆幸的。

“七七事变”后，中央军委和中宣部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军到山西前线工作。在筹备期间，西战团学习人民剧社等红军宣传团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利用各种民间形式，旧瓶新酒，新瓶新酒，宣传党的团结抗战政策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除了排练话剧、歌曲外，西战团设有杂耍组，组织团员学习采用大鼓、小调、相声、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了许多新颖节目，如京韵大鼓《大战平型关》在前方部队演唱时，每次都轰动全场，前方政治部还把它作为教材，印发给连队的每个战士。他们根据东北秧歌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虽然情节简单，故事性不强，但因为有了全民抗战的新内容，有根据人物身份而选择的舞姿，一九三八年春天在西安搬上舞台时，广大市民观众也为之耳目一新。这些形式都是旧的，也可以说是土的，但一旦经过改造、加工，得到了提高，便成了新的，使某些洋的也相形见绌。因为“洋”并不新，“洋”也有很旧的东西，不为群众所接受；“土”并不意味全是旧，只要能推陈出新，与人民生活相结合，与时代合拍，就成了新，就能为群众所喜爱。

后来，延安又涌来了更多的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他们带来了大后方、大城市的一些中外闻名的文学艺术作品，对推动和提高延安文学艺术工作的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有些人就觉得延安原有的文艺太“土”了；有的人认为原来的都是宣传品，没有艺术性；有的人认为过去的那些节目只是豆芽菜；更多的人被从未见过的堂皇的布景、美

丽的服装、变化的灯光、曲折的情节、宏伟的场面所吸引。很多人对此欣赏欢迎，一些文艺工作者争相仿效，于是搞闭门造车，关门提高，厚古薄今，官必称希腊。有些文艺工作者感到迷茫，无所适从。有些人比较清醒，感到这些大、洋、古，虽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脱离了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没有反映人民当前的现实生活和要求，脱离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忽略了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党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提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方法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宗派主义问题、学习马列主义等问题。讲话指出：人民的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到生活中去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热烈愉快地参加整风学习，端正自己的立场，改进自己的工作，人人精神振奋，轻装上阵，深入工农兵，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而学习，创作。一段时间以后，新的木刻、密切结合群众、反映群众斗争的木刻在古元、彦涵等同志的刻刀下出现了。艾青写了对劳动模范的赞歌、李季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新民歌，欧阳山等写了歌颂英雄、歌颂光明以及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接着是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以及民间说书等都以抗日战争和曲折的阶级斗争为题材而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时的秧歌经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改造、提高，也从初级发展成为生动、活泼、新鲜的小歌剧。每当《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等演出时，锣鼓一响，人们都从窑洞里涌出，冲下山坡，围满广场。陕北的冬天虽然很冷，但演出场上的热烈气氛，把人们的心都溶化了。那种场面永远留在演员和观众的

记忆里。那种亲切美好的享受将使人终生不忘。至于《血泪仇》、《白毛女》，更是当时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这些从土到洋，既土又洋，从旧到新，真正是新的作品，代表了那一个伟大的时代，深受群众的欢迎拥护。把当时一些洋里洋气的作品自然比下去了。原来一些看不起“土”、倾心于“洋”的人，这时也开始认识到只有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才能在艺术上有所成就，有所创新；他们羡慕那些有深厚生活基础的作者和他们创作的反映了人民要求的作品。

现在是八十年代了，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在新形势下，一些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这个“土”与“洋”，“新”与“旧”的问题上又产生了迷茫。曾在土的基础上创新过的一些同志，也为某些“洋”吓住了，自己羞于与“洋”媲美。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延安时代的文艺是早已过时、陈旧、落后，沦为“土”了；就是沿着延安道路发展壮大的五十年代的文艺，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也都成了过时的土产，不足以为范的了。但究竟从哪里去学“洋”、去创“新”呢？是否就是找一些在国外曾时兴过一阵、后来又被舍弃了的什么现代派、印象派、意识流、或者把三十年代被人们批评过的那些鸳鸯蝴蝶派、那些鄙视政治思想、只求趣味，实际也是从洋人那里运来的唯美派等等作为我们仿效的榜样呢？其实这些才都是旧的，在国外早就成了旧的。这自然不可能给我们的创作以新的血液，沿着这条路，才是一条真正的老路；走这样的老路，决不可能创新。这种“新”不合乎我们的国情，也不合

乎我们人民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只保持着延安文艺的水平，创作方法、内容、形式都没有新的突破，那也是不行的。时代前进了，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从前的都不一样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文化水平都不一样了。我们文学的内涵、形式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那就是停滞、保守、落后。客观变了，人们的认识不变，自然就不适应，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创新。立意创新时，我们可以借鉴古人，做到“古为今用”；也可以借鉴西洋，做到“洋为中用”，象鲁迅先生曾说的，对外国好的，于我有用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对外国的洋东西，我们不应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轻信，要有分析，有选择，我们要拿来的只是在外国人民中也是经过考验，并且于我有益的东西。就象果木嫁接，植物杂交，都要经过反复筛选，而且必定要以适合本乡本土的气候、土壤等条件的母本为主，本固才能枝荣，嫁接、杂交才能成功，才能结出新果。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先要自己解放自己。

近年来有的人提倡解放思想，博得了一些人的拥护。但我仔细观察，我怀疑其中有些人是不是又落进很不解放的网里了？他们画地为牢，把思想解放用绳子圈起来了。有的人虽以“新”为旗帜，但自己的一些言论又确是老生常谈，不合乎现代人的思想要求。有的人怕“土”求“新”，实际也成了一条枷锁。我希望作家能够解放自己，创作时不去计较是“土”是“洋”，是“新”是“旧”，只写自己所要写的。我以为没有固定的“土”，也没有固定的“新”。好的、美的、有时代感的，能引人向上的就是新；无聊的、虚幻的、生编硬造的，不管是从哪一个外国学来的都是陈旧的，都是“土”的。作家怎样才能解放自己？就是要完全、彻底去掉私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把自己看到的、体会到的一切社会现象，

摘其感人的，能使人爱、使人恨，使人思索的种种，尽情再现出来。作者的思想越深刻，描绘越细致，就能越有诗情画意，越能动人心弦。作家创作时只是追求精益求精，毫无个人打算，才能无所顾虑，舒展自由，无往不通，取得成就，真正创新，哪里还分什么“土”，什么“洋”呢！

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战斗纲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颁布了新宪法和批准了第六个五年计划，非常鼓舞人心。去年，当年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集会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决定成立《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组织全国各地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分卷编选在延安和写延安的各种文艺代表作。负责编选的许多同志，不顾年老体弱，克服因长期战乱带来的材料散失的困难，和年轻人合作，短期内编选成册。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保存这一宝贵的文学史料，慨然承担印刷出版的重任。编委会索序于我，我谨撰此文表示我对这一工作的支持，同时也再一次表示，和许多同志一样，我对延安文艺路线的拥护。我相信，在延安文艺获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坚持双百方针，不断地探索追求，我们必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新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

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于云南西双版纳州

## 《诗 歌 卷》

### 前 言

延安，当年的延安，是一个何等美丽、神圣的名字啊！

延安，当年的延安，是革命的摇篮，是中国长夜里的北斗星，是大海航行的灯塔，是抗击敌人、争取胜利的司令台！是人们百年来牺牲奋斗追求的希望之所寄托，是光明、正义之所在！

延安，你是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你是世界人民瞩目的地方。用多么美好、深情的语言形容你，用多么诚挚的赞歌献给你，仍不能表达人民心头的感佩于万一！

当年抗日的烽火熊熊燃起，青年们热血沸腾，争先恐后地投奔延安这抗日、民主的圣地；穿过敌人封锁，长途跋涉，不畏艰险，投奔到你的怀抱里。

这里是母亲般的温暖的怀抱，又是革命的炽热的熔炉，在这里烧去了污秽的杂质，经过刻苦的锤炼，许多人成长为有益于人民的人。

诗人是最具有丰富的革命热情的。延安，正象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大批诗人，满怀激情投奔而来；延安，又用清亮的延水和金黄的小米，哺育和培养出了大批年轻的诗人。

“狂飙诗人”柯仲平来了，以他那喷发的情热朗诵，激动着听众的革命感情。毛泽东同志也常和大家一起，静静地听着他晚会上声如洪钟的诗歌朗诵。他带着剧团，走在乡野的小路上，走在山

山峋峋的小路上，学习着、尝试着运用群众的语言来反映重大的题材，写出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

曾经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诗人田间来了，他和其他诗人一起，积极倡导和参加街头诗运动，使诗歌面向群众，走入群众中去。以后他去敌人后方，写了许多战鼓式的诗，得到著名老诗人闻一多的高度推崇。

善于写优美精致的抒情诗的何其芳来了，他到敌后访问，再回延安，从事教学工作。他以娓娓抒情的亲切的笔调，描绘着他对于新的社会、新的生活的崭新的感受。他善于唱出自己心灵深处的颤动。他的诗赢得了青少年们的喜爱。他热忱地赞美革命，鼓舞人们勇敢地向旧世界进军。

长期在苏联工作，在国际有影响的诗人萧三来到延安。他的诗风并没有欧化的影响，而是有着平易的民族化的情调。他主编油印诗刊《新诗歌》，团结了一批中、青年诗人。他主持“文化俱乐部”，在窑洞前土坪的茅亭里，经常举行诗歌讲座和诗歌朗诵，活跃了延安的文化生活。

早在一九二四年就开始发表诗作的著名诗人严辰来了。在这里，他那一贯追求革命的激情，得到了淋漓的表现；他那娴熟的诗艺，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积极参加诗歌活动，指导青年写作，并写下了《我们的队伍》、《路》等名篇，取得了新的成就，这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

以写《大堰河》闻名的艾青，抗战初期他写了许多长诗，如《吹号者》、《火把》等。一九四一年春天他来到延安，也许这是由国统区来到延安的最后一批诗人了。他写作勤奋，发表了许多短诗，发表了可称之为《大堰河》姐妹篇的《我的父亲》，深刻锐利，入木三分。他还用新的风格写了农民翻身的长诗和《雪里钻》长诗；同时，主编二十四开本的《诗刊》。

公木、天蓝，除写诗外，还和音乐工作者合作写了一些歌词。公木是一个诗歌团体的中坚，他的《再见吧，延安！》、《风箱谣》等都深受人们欢迎。天蓝写作讲求质量，他的《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民》、《队长骑马去了》等，是脍炙人口的诗作。

鲁慕到过前方，又回延安。他爱写山、川、花、草，通过他的慧眼，赋予大自然以新的美，天真中饱含着真情。贾芝、李雷、刘御……也都做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

诗人张光年（光未然）、塞克，写了广泛传诵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歌词。

在那火红的年代，诗的时代，一些很少写诗的作家和一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也忍不住要歌唱起来，如胡乔木、丁玲、陈学昭、周立波、严文井……各以自己的表现方法，写出了他们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对新的现实的感受，和坚持抗战的决心。

还有一些诗人，虽然时间或长或短在延安生活和工作过，但他们的诗主要是在其他地方写作或发表，在延安却正好没有写，也有的可能写了，却因找不到资料，未能编选，这不能不是极大的遗憾！

在延安，学习、工作、劳动，……精神舒畅、自由，生活单纯、愉快，一切是火红的，一切充满朝气。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大批新的诗人成长起来：贺敬之、郭小川、朱子奇、井岩盾、赵自评、胡征、白原、侯唯动、孙剑冰、李方立、李季、闻捷、戈壁舟、李冰……（这一长串名字，一定有不少遗漏），他们中不少人在当时和以后，写出了许多佳作，成为中国诗坛的生力军。他们都会承认，这和延河水对他们的哺育是分不开的。

贺敬之，这位当时比较年轻的诗人，很快即为人注意。他对新生活唱的歌是轻快欢乐的，而那些刻划旧日农村的故事，则是悲凉的有力的控诉。他写了许多流畅的歌词，和激动人心的《白

毛女》歌剧的唱词。

有着部队和农村基层生活经验的李季。由于他对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学习，使他能熟练地运用这种形式写成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诗最初在《三边报》发表，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后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受到陆定一同志的推荐和赞许，给诗歌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延安的诗歌创作非常活跃。虽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物质生活相当艰苦，但是党中央仍然为诗人、作家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创办了专门的诗的刊物。如前述的《新诗歌》，先在延安油印出版，以后去绥德铅印出版；如《诗刊》，用马兰纸铅印，出过六期。此外，《中国文化》，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谷雨》，鲁迅艺术学院《草叶》，总政的《部队文艺》，边区文协的《大众文艺》，由周扬、夏衍主编在重庆出版的《文艺战线》，肖军等编的《文艺月报》……都刊载过许多诗歌。特别是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创刊以后，副刊上经常刊载诗歌，对延安的诗歌创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延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通还不曾阻断的时候，延安的诗作，也大量的在大后方的刊物如《文艺阵地》、《七月》、《诗创作》……以及《新华日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其中有的是辗转传递出去的，有的是从边区的报刊上转载的。这些诗歌，用它思想和艺术所达到的新的高度，为大后方的读者们所欢迎。

延安的环境，不仅为创作提供了出版的方便，更主要的，为吸取创作源泉提供了深入生活的良好的条件；许多同志参加了英勇的对敌斗争，和战士、民兵一起，患难相助，生死与共，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许多同志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担任

工厂的工作，农村的文书，参加开荒种地，纺线缝衣的生产劳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这正是延安诗风得以创新并能获得读者喜爱的根源。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许多诗人、作家实践了这条道路，取得了丰富的收获，并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去。

在生活和创作的实践中，自然地提出了诗歌的形式问题。诗歌的大众化、民族化尝试的课题，摆在了诗人们的面前。理论家由此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诗人、作家们，则以他们的创作实践，作了各种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当然，诗歌民族化的倡导和探索，并不是框框，并不限制其它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诗歌的创作。有的同志喜爱运用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有的写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诗，有的写惠特曼式的诗，有的写民歌体，有的写十四行体，还有的写旧体诗词。各抒己长，争放异彩。

不错，旧体诗词这朵花，在延安这新的土壤上，还开放得格外茁壮，艳丽。

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以它新颖的构思，宏大的气概，震惊了大后方，轰动了文艺界。丁玲同志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写给她的《临江仙》，含意深邃，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鼓励，读来令人振奋。毛泽东同志另外一首未发表过的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则是建国后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作品，亲切朴实，别具一格。

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续范亭、李木庵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在延安成立

了“怀安诗社”。他们交换诗稿，互相唱和，歌颂抗战业绩，吟咏新的现实，育志抒怀，激励了读者，也鼓舞了革命情绪。

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领导人，也是优秀的诗人。他熟练地运用旧体诗词的格律，抒发革命的情怀，既流畅易懂，又琅琅上口。《延安宝塔歌》、《七大开幕》等，别具一格，充满激情。

写古体诗词这一支强大的队伍，和新诗的队伍，互相辉映，互相补充，并肩前进，汇合成了延安诗歌的滚滚洪流。

可惜的是，当年的资料，经过战乱，经过十年浩劫，很多都散失了，这给编选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的作者，我们还记得当时是发表过有分量的诗的，但因找不到资料，选目中就只能暂付阙如。

编委会曾发出过大量征集稿件与资料的信。承同志们热情支持，寄来了他们的作品或报刊，谨表谢忱！有的同志，可能工作较忙，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回音，只得从能够找到的单行本或其他资料中予以选录。如有不当，尚希指出！有的同志回信中开列了篇目，却没有诗稿和出处，也就无法选进，真是十分抱歉！

有些诗人在当时写得较多，并有较大的成就，作品选得比较多些。在首数与行数方面，互有参照。有的作者的诗，在今天看来，可能未必尽善，但它反映了当时的风貌，保持了历史的特色，所以仍然保留了。本卷分为新诗和古体诗词两部分，每部分作品的顺序，是按照作者姓氏笔画排列的。

总的说来，由于篇幅的限制，大量的诗作未得收录，事非得已，当能得到作者们的鉴谅。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肯定还有一些应该选进的作品被遗漏了，希望保存有延安时期诗歌创作资料的同志，能把资料借给我们，以便在《诗歌卷》再版的时候补充进去，使选集更加完备。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这次在编选过程中，曾选编了一部分当